

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述評 ——論劉逢祿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說

張高評*

摘要

綜考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，其核心問題有二：即左氏非丘明，與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。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之駁難略謂：左丘明為孔子朋友，非孔門弟子；作《傳》之左丘明，與《論語》之左丘明同為一人；左氏為魯史官，受學不需師保；左氏與孔子曾共觀周史，經傳足相發明。章氏引《孔子家語·觀周篇》，強調孔子與左丘明，共乘觀周，《經》之與《傳》「同作具修」，「相持而成」，相互表裏。本文為考察《左氏》與《春秋》之依違離合，分三端論述：其一，《左氏》之自釋《春秋》，不在其名《傳》與否。其二，傳體之不同，乃諸家解經視點殊相之本然。除《穀梁傳》、《喪服傳》、《夏小正傳》，與《公羊傳》同體外，解經之諸傳無一與《公羊傳》雷同。其三，《經》闕《傳》詳之故，或詳《經》所不及，或因割《傳》以附年，或由私書而闕誤，或為發揮《經》之微言，或為明刊削而昭簡擇，或為著其「不書」、「不言」、「不稱」，以見《春秋》之微言大義。要之，《經》闕《傳》存，與「不傳《春秋》」無涉。《左氏》必有後學之緣飾附益，顧不必然出於東漢劉歆，太炎先生批語於此語焉不詳，楊向奎指為「駁辯無力」。筆者以為：《左氏》是否有後人緣飾附益，與《左氏》是否傳《春秋》，應是二事，似不應混為一談。

關鍵詞：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 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 《左氏春秋考證》 章太炎 劉逢祿

*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

一、前言

《左氏傳》之作者，是否為與孔子同恥之左丘明？《左氏傳》之成書，是否跟《春秋》經有密切關係？這兩大焦點，相互糾葛交會，形成西漢以降，《春秋》《左傳》學之關鍵議題，更牽涉到今古文之爭，以及經學與史學之分野與流變。

魯君子左丘明，為《左氏傳》之作者，曾親炙於孔子而作傳，隋唐以前儒者未嘗異議。至中唐啖助、趙匡《春秋集傳纂例》，始倡「左氏非丘明」之說，遂啓宋元以來疑經疑傳之路。北宋王安石《春秋解》，證「左氏非丘明」者十一事；南宋鄭樵《春秋傳》，亦撰〈左氏非丘明辨〉，列舉八驗，以證「左氏為六國人」。除外，陳振孫、劉安世，元程端學《春秋本義》、清崔述《洙泗考信錄》，亦多推衍啖、趙「左氏非丘明」之說。¹ 至晚清劉逢祿（1774-1829）《左氏春秋考證》二卷，更提出「劉歆偽作《左傳》」說，康有為（1858-1927）《新學偽經考》附和之，遂蔚為一大學術公案。

劉逢祿、康有為，乃晚清今文學派治《公羊傳》之學者。為尊崇《公羊傳》之解經地位，乃攻伐古文學《左氏》之傳不合《經》，且強調作《傳》之人非受《經》於孔子，「擒賊先擒王」，固其主要策略。錢穆《劉向歆父子年譜·自序》稱康有為《新學偽經考》：「持其說最備，余詳按之皆虛。要而述之，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。」略謂：劉歆並無偽造群經之時間，更無偽造群經之必要。² 錢賓四先生據年譜事實駁論，鐵證如山，信而有徵。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二卷，立論之偏頗虛妄，尤為《新學偽經考》之先鋒，經由章太炎先生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之批駁，是非疑似之間，乃有裁斷與定讞。要之，論經傳關係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之見最為宏通持平，所謂「刪除事跡，何由知其是非？無案而斷，是《春秋》為射覆矣」；「今仍定為左丘明作，以怯眾惑。」³ 《四庫全書》、章太炎、錢穆等學者，於《左傳》作者問題、經傳關係，雖已作明確之論述，然仍有陳槃《左氏春秋義例辨》、⁴ 徐仁甫《左傳疏證》、⁵ 德國佛郎克（O·Franke）、日本津田左右吉、飯島忠夫等，⁶ 猶拊拾劉逢祿、康有為之說，主

¹ 張高評：《左傳導讀》，第三章第一節〈論左傳之作者〉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頁29-40。

² 錢穆：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》，〈劉向歆父子年譜·自序〉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年），頁1-7。

³ 紀昀等編纂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二十六，〈經部二十六·春秋類一〉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4年），頁536。

⁴ 陳槃：《左氏春秋義例辨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七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3年）。

⁵ 徐仁甫：《左傳疏證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）。

⁶ O·Franke, "The Ch'un Ts'ew with The Tso Chuen," *The Chinese Classics*. Vol.V.in 2 parts, Hougkoug, 1972。津田左右吉：《左傳的思想史的研究》，載《東洋文庫論叢》第二十二，昭和十年。飯島忠夫：《支那曆法起原考》，東京岡書院，昭和五年出版。前後二書并引見《春秋經傳引得·序》。日本新城新藏之說，見《東洋天文學史研究》。法國馬伯樂之說，見"La Composition et la date du tso tchousn," *Me'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*, (Bruxelles, Vol. I. 1931-1932), pp.137-208。二說均引見《春秋經傳引得·序》。

張劉歆增竄《左氏》而成《左傳》。此一學術公案，初因劉歆〈移太常博士書〉引發今古文之爭，當時焦點只在立於學官與否，其後衍為經傳依違關係，又孳生為《左氏》作者問題。至晚清劉逢祿、康有為，乃合二者而之，以之抑《左氏》而尊《公羊》。時至今日，學派意氣之爭，理當適可而止。今欲談民國以來之《春秋》《左傳》學，乃選擇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為研究文本，旁及章氏《檢論·春秋故言》、《春秋左氏疑義答問》、《煊書》，而以章氏批駁劉逢祿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說為核心，進行論述。

綜考劉逢祿著《左氏春秋考證》，其核心問題有二：即左氏非丘明，與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。所謂「左氏非丘明」，看似討論《左傳》作者，其實更涉及作者與孔子之關係，竟究為師徒或朋友；更擴及親受或傳聞，弟子或私淑諸問題。如云：

劉曰：曰魯君子，則非弟子也；太史時名《左氏春秋》，劉歆《七略》始名《左氏傳》。
(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10)

曰《左氏春秋》，舊名也；曰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則劉歆所改也。(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10)

今本《左氏》書法，及比年依《經》飾《左》、緣《左》、增《左》，非歆所增益之明證乎？(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7)

凡此，皆由「左氏非丘明」推衍，而有劉歆偽作《左傳》之說。劉逢祿等之邏輯思維，蓋欲攻傳之不合經義，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；欲攻伐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，故先就「左氏非丘明」發難。彼等以為，若能論證《左氏傳》為劉歆等偽作，自然有助於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之命題。

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一書之主要論點，不在「劉歆偽作《左傳》」論，關鍵在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說。如云：

曰《左氏春秋》，與《鐸氏》、《虞氏》、《呂氏》並列，則非傳《春秋》也。(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10)

太史公時名《左氏春秋》，蓋與《晏子》、《鐸氏》、《虞氏》、《呂氏》之書同名，非傳之體也。(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1)

論本事而作《傳》，何史公不名為《傳》，而曰《春秋》？……經所不及者，獨詳志之，又何說也？《經》本不待事而發。夫子曰：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」，何《左氏》所述君子之論乖異也？(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5)

《左氏》所載事實，本非從聖門出，猶《周官》未經夫子論定，則游、夏之徒不傳也。
(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6)

《春秋》非史文，言《左氏》者以史文視《春秋》，宜其失義也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45）

左氏生哀公之後，其書惟名《春秋》。班氏以史論《左氏》，知《左氏》者也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52）

劉逢祿為論證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說，曾廣徵博引《史記》、《春秋歷譜牒》、《世本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漢書》〈藝文志〉、〈劉歆傳〉、〈儒林傳〉、〈王莽傳〉、《後漢書》〈鄭興傳〉、〈范升傳〉、〈賈逵傳〉、〈李育傳〉、〈班彪傳〉，劉向《別錄》、《嚴氏春秋》、《經典釋文》諸書，以建構其理論。考其論點，大抵有六大端：其一，名稱不符；其二，傳體不同；其三，經傳存闕；其四，述論乖異；其五，緣飾增續；⁷ 其六，以史文視《春秋》。其論點似是而非者多，值得進一步商榷。今取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為文本，選擇其中批駁劉逢祿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之觀點，稍加述說，徵引學界研究成果作為佐證，以見章氏《春秋》《左傳》學之大凡。為篇幅所限，今只就兩大議題加以討論，其一，左丘明與孔子之關係；其二，《左氏》與《春秋》之依違問題，論述如下。

二、左丘明與孔子之關係

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之論點，主要強調《左氏》與《春秋》之間，並無經傳之依存關係，所謂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者是。欲證明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，故先否定《左氏》之作者跟孔子之密切關係；欲否定左氏與孔子之關係，遂提出「左氏非弟子」，「其好惡亦大異聖人，必非《論語》之左丘」諸說。邏輯學中之演繹法，有所謂三段論證，若能駁斥大前提不能成立，則小前提與結論亦隨之成為謬說，⁸ 此乃「擒賊先擒王」之絕佳策略。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於此頗有批駁，考察章氏之駁文，大抵有四大方面：其一，左丘明為孔子朋友，非孔門弟子；其二，作《傳》之左丘明，與《論語》之左丘明同為一人；其三，左氏為魯史官，受學不需師保；其四，左氏與孔子曾共觀周史，經傳相互表裡。分論如下：

（一）左丘明為孔子朋友，非孔門弟子

孔子著《春秋》，左氏為之《傳》，此古文家之說。為問作《傳》之左氏，與孔子之關係為何？是師徒，亦或友朋？劉逢祿據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，稱《春秋》三傳中，惟公羊氏得孔子「口授其傳指」，其言曰：

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：「是以孔子明王道，干七十餘君，莫能用，故西觀周室，論

⁷ 同註1，第五章第二節〈駁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說〉，頁104-117。

⁸ 歐文·M·柯匹（Irving M. Copi）、卡爾·柯恩（Carl Cohen）著，張建軍、潘天群等譯：《邏輯學導論》，第六章〈直言三段論〉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251-286。

史記舊聞，興於魯，而次《春秋》，上記隱，下至哀之獲麟。約其辭文，去其煩重，以制義法，王道備，人事決。七十子之徒，口受其傳指，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。」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10）⁹

劉（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）曰：「此言夫子《春秋》，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，今所傳者，惟公羊氏而已。」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10）

駁曰：左氏、公羊氏皆不在七十子中。而左氏親見素王，則七十子之綱紀。《公羊》末師非其比也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10）

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序》但言「七十子之徒，口授其傳指」，可見司馬遷深信受經傳指者為「七十子之徒」，於是劉逢祿坐實「七十子之徒」中，惟公羊氏受夫子《春秋》之傳指；而章太炎駁斥劉說，以為「左氏、公羊氏皆不在七十子中」。易言之，公羊氏、左氏，皆不屬孔子弟子。然劉逢祿已先發制人，曾謂「曰魯君子，則非弟子也」；章氏乃就此闡發，論定左丘明與孔子「是朋友，而非弟子」，其言曰：

（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）：「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，各安其意，故因孔子史記，具論其語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」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10）

劉曰：「夫子之經，書于竹帛，微言大義不可以書見，則游、夏之徒傳之。丘明蓋生魯悼後，徒見夫子之經及史記、《晉乘》之類，而未聞口受微指。當時口說多異，因具論其事實，不具者闕之。曰『魯君子』，則非弟子也。」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10）

駁曰：至孔子言「與左同恥」，則是朋友而非弟子，易明也。何見必後孔子者乃稱「魯君子」乎？謂生魯悼後者，以《傳》有悼之四年，據《魯世家》言，悼公在位三十七年，去獲麟已五十年耳，然使左氏與曾子年齒相若，則終悼世尚未及八十也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12）

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先言「七十子之徒」口授孔子傳指；繼又言「魯君子左丘明」、「因孔子史記，具論其語」，上下連讀，容易生發錯會，以為左丘明乃「七十子之徒」之一。試考察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，未言左丘明為孔子弟子；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〈諸子略〉亦不過言：「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，失其真」云云，亦未言左丘為孔子弟子。章氏駁論觀點有二：《論語》載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」，則彼此「是朋友而非弟子」。《傳》載「悼之四年」，或左丘明

⁹ 章太炎：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初見《章氏叢書》正編，為民國八年浙江圖書館校刊本，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58年），頁1-28。其後，《章太炎全集》出版，第二冊載有《春秋左傳讀》、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及《駁箴膏肓評》三書，為標點本，流傳較廣。今徵引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為便於查考，皆據此標點本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4年）。

壽考，故八十猶能著書；或古籍多後人續書，此乃另一話題（詳下）。由是而衍生下列論點：與孔子同恥之左丘明，與作《傳》之左丘明，是否為不相干之二人？這牽涉到著書體例與道德表現，是否一律不二之課題。

（二）作傳之左丘明，是否即同恥之左丘明

《論語·公冶長》載孔子之言曰：「巧言令色，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」劉逢祿據此，援引《漢書·劉歆傳》，以為「為《左氏春秋》者，必非《論語》之左丘。其好惡亦大異聖人。」劉氏之論點，章氏之批駁，如云：

（《漢書·劉歆傳》）：「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，親見夫子，而公羊、穀梁在七十子後，傳聞之與親見之，其詳略不同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8）

劉曰：「《論語》之『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』，其親見夫子，或在夫子前，俱不可知。若為《左氏春秋》者，則當時夫子弟子傳說已異，且魯悼已稱諡，必非《論語》之左丘。其好惡亦大異聖人，知為失明之左丘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8）

駁曰：以《論語》之左丘明非失明之左丘明，啖趙輩始為此說，而宋儒祖述之，非有明據。果如劉秀、劉歆之有二，何以《古今人表》但有一左丘明耶？縱令誤信子駿，認為一人，然他書別見者，子駿不能盡改，豈孟堅皆未見乎？若他書亦不言有二左丘明，則啖、趙之說為馮臆妄造明矣。且異人同名者，未有相沿不辨之事。……若左丘明果有二人，何以自漢至唐，茫不訾省？啖、趙輩所據何書，而能執此異解？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8-829）

《左氏》之作者，為與孔子同好惡之左丘明，自司馬遷《史記》、班固《漢書》、桓譚《新論》、王充《論衡》、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，乃至於漢末魏晉之大儒，若賈逵、鄭玄、何休、范甯、杜預等著書，率皆無異辭。至唐趙啖《春秋集傳纂例》始稱：「《論語》所引丘明，乃史佚、遲任之類。後人謂左氏為丘明，非也。」趙匡亦謂：「且夫子自比，皆引往人。……丘明者，蓋夫子以前閒人。」「自古豈止一丘明姓丘乎？何乃見題左氏，悉稱丘明？」可見劉逢祿《考證》，蓋本趙、啖之說。章氏之駁論，以為上述主張，「非有明據」，且以為「異人同名者，未有相沿不辨之事」。力主《論語》之左丘明，即為經作傳之左丘明，同為一人，非二人。然《論語》所載好惡與孔子同恥之左丘明，如何即是「因孔子史記，具論其語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」之左丘明，章氏所言語焉未詳，而左氏身為魯史官之職守，可以回應此一疑難。請看下一節之論述。

（三）左氏為魯史官，受學不需師保

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稱：左丘明「因孔子史記，具論其語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」；《漢書·藝文志》稱：「仲尼思存先聖之業，以魯周公之國，禮文備物，史官有法，故與左丘明觀其史

記。丘明論本事而作《傳》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說《經》也。」二者皆可印證，為經作《傳》者身分為史官。所謂因本事「具論其語」，所謂「論本事而作《傳》」，此揭示修纂《左傳》之體例，實據史料文獻編纂，作鑑空衡平之論述，所謂「明夫子不以空言說《經》也」。丘明論事作《傳》，不容好惡私意挾雜其間，自與道德修養體現之善善惡惡標準殊異不同，如云：

（《漢書·劉歆傳》）：「初《左氏傳》多古字古言，學者傳訓故而已，及《歆》治《左氏》，引《傳》文以解《經》，轉相發明，由是章句義理備焉。」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6）

劉曰：「《左氏》所載事實，本非從聖門出，猶《周官》未經天子論定，則游、夏之徒不傳也。……」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6）

駁曰：……又謂《左氏》所載事實，本非從聖門出，此尤可笑。十二諸侯之事，布在方策，非如覃思空理，以聖門所出為貴。假令事非誠諦，雖游、夏盈千言之，亦足安信？……左氏本是史官（《藝文志》云：「左丘明，魯大史」），受學不需師保，《藝文志》所謂「據行事，仍人道，因興以立功，就敗以成罰，假日月以定歷數，藉朝聘以正禮樂」者，親聞聖旨，自能瞭如。至如游、夏之徒，玩習經文，人人異端，豈以聖門之資望，遂能強人信受？言之不從，斷可知矣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7-828）

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所言，有二點可資討論：《左氏》所載事實，即是史官所書之歷史；左氏為魯太史，受學不需師保，所載事實當然「非從聖門出」。章太炎駁論所謂「十二諸侯之事，布在方策，非如覃思空理，以聖門所出為貴。」此言得之。元趙汭（1319-1369）《春秋師說》載其師黃澤（1300-1346）之言曰：「夫子修春秋，蓋是徧閱國史。策書簡牘，皆得見之，始可筆削。」又曰：「策書是重事，史官不以示人，則他人無由得見。如今國史，自非嘗為史官者，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。」又曰：「左氏是史官，曾及孔氏之門者。古人是竹書，簡帙重大；其成此傳，是閱多少文字？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；非及孔氏之門，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篤。」¹⁰ 誠然觀國史、閱策書是「重事」，史官不以示人，今日猶然。自非嘗為史官者，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；左氏既是史官，孔子因可藉彼同乘觀周，進而「徧閱國史」，既得而見之，遂可筆削以成《春秋》。

（四）左氏與孔子曾共觀周史，經傳互為表裏

考諸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除揭示「魯周公之國，禮文備物，史官有法」外，又有左丘明與孔子「偕觀史記，丘明論本事而作《傳》」之記載，其文莫詳於《嚴氏春秋》，如：

¹⁰ [元]趙汭：《春秋師說》三卷，[清]徐乾學、納蘭成德校訂：《通志堂經解》，第 26 冊，（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70 年）。張高評：〈黃澤論《春秋》書法——《春秋師說》初探〉，2、1「研治春秋，魯史書法與聖人書法應相濟並用」，《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》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公司，2002 年），頁 159-166。

沈氏云：「《嚴氏春秋》引（《孔子家語》）〈觀周篇〉云：『孔子將修《春秋》，與左丘明乘如周，觀書於周史。歸而修《春秋》之經，丘明為之傳，共為表裏。』」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58）

駁曰：若《春秋》則孔子自作，異於古書，欲求其義，非親炙則無所受，欲詳其事，非史官則不與知。蓋有觀其事而不知其義者矣，倚相、史儋之屬是也。若未觀其事而求解義，猶未鞫獄而先處斷，斯誠曠古之所未聞。難者曰：誠如是說，寧知左氏非與倚相、史儋同類？答曰：偕觀史記，助成一經，造膝密談，自知其義。惜乎倚相、史儋之徒不遇孔子，若得參預《春秋》之業，亦寧患其不知也？既有左氏，具論本事，為之作《傳》，後世乃得聞而知之。舍此而欲聞知，雖有眇義，亦所謂郢書燕說者爾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9-830）

《經》有丘明所作者矣。《傳》文時舉魏賜繁纓，晉鑄刑書，鄭獻陳捷，紇却齊田，婁戡豎牛，胙數鬻獄，僞存鄉校諸事，不見于《經》者而稱聖論，定其是非，明諸所錄事狀，獲麟以上，皆造郤受意焉，故《傳》亦秉仲尼作也。此其為書，猶談遷之《記》，彪固之《書》，父子戮力，九揉不分。故桓譚曰：「《左氏傳》于經，猶衣之表裏，相持而成。《經》而無《傳》，使聖人閉門思之，十年不能知也。」（章太炎《檢論》卷二〈春秋故言〉，《章氏叢書》本，頁 532）

因為魯國史官有法，故孔子與左丘明同乘觀周。左氏本是史官，受學不需師保；左丘親炙受經，非史官不能；左氏於孔子，偕觀助成，密談知義，由是相得益彰，功德圓滿：「歸而（孔子）修《春秋》之經，丘明為之傳，共為表裏。」太炎先生《煇書·尊史》稱：孔子西觀周室，取百二十國寶書以著《春秋》，其中最可貴者為經由孔子筆削，表現為「竊取」之「義」，即成寄託褒貶之「微言大義」，故《春秋》若無「見諸行事」之《左氏》為之作《傳》，只是「徒託空言」之歷史哲學而已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謂「論本事而作《傳》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說《經》」；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稱：「漢晉以來，藉《左氏》以知經義；宋元以後，更藉《左氏》以杜臆說。」¹¹ 故章太炎駁論批評捨傳以解經，「若未觀其事而求解義，猶未鞫獄而先處斷」，猶郢書燕說而已。章氏《檢論·春秋故言》更枚舉魏賜繁纓以下七事證，謂《左氏》「不見于《經》者而稱聖論，定其是非」，可見《左氏》造郤受意，《傳》秉仲尼。又援桓譚《新論》為證，可知《經》《傳》相表裏。諸家之說，彼此可以交相發明。章氏《春秋左氏疑義答問》亦云：

四、孔子修《春秋》緣起……則知丘明述《傳》，本不以弟子異言故。《嚴氏春秋》引〈觀周篇〉：「孔子將修《春秋》，與左丘明乘如周。觀書於周史，歸而修《春秋》之經，

¹¹ 同註 3，《春秋左傳正義》提要，頁 537。

丘明為之《傳》，共為表裏。」此則《春秋》經傳同作具修，語見〈觀周〉，嚴氏雖治《公羊》，不能非聞。桓譚《新論》稱云云，言相持而成，則《經》《傳》同修可知。（章太炎《檢論》卷二〈春秋故言〉，《章氏叢書》本，頁532）

所以爾者，《經》有從赴告、諱國惡之文，不以實事付之於《傳》，則遠慙南董之直；必改赴告忌諱以從周室史記，則非魯之《春秋》，是以相持成書，事義始備。觀周之役，本兼為《經》《傳》行也。且後人作史，尚不得有本紀而闕列傳，以聖哲參會，鑒不及斯乎？（同上）

章氏再三申說《嚴氏春秋》所引《孔子家語·觀周篇》，強調孔子與左丘明，共乘觀周，《經》之與《傳》「同作具修」，「相持而成」。因此《左氏》與《春秋》，必須「相持成書，事義始備」，猶後世修史，列傳與本紀，彼此參會，相得益彰者然。桓譚《新論》稱《左氏傳》于《春秋》經，相互表裏之言，於《左氏》傳《春秋》，最稱具體明白。

要而言之，左氏傳之作者確為左丘明。國史非史官莫能見而知其詳，一也。古無私家著述之事，惟史官躬與國史之修，二也。左氏集百二國寶書而為《傳》，非史官不能成此重大之簡編，三也。左丘明為魯太史，故《左傳》稱魯為「我」；且太史受學不需師保，能躬閱國史策書，四也。史德據事直書，與修德之惡夫巧佞殊科，作《傳》之左丘明與同恥之左丘明乃一非二，五也。左氏與孔子同時，以修《春秋》必謀之史官，故丘明不入弟子之列，六也。總之，左丘明之為《左氏傳》作者，是太史公稱為魯君子，《別錄》《七略》以為魯太史，論語稱其「同恥」，而班彪謂在定哀之間，亦下及悼元之世者也。¹² 至於《經》《傳》關係，《嚴氏春秋》強調同乘觀周，桓譚《新論》指稱表裏相成，劉師培〈讀左劄記〉更論證：「《左傳》一書，與《春秋》經文相輔」；「漢初諸儒莫不以《左傳》為釋經之書，不獨劉歆謂左丘明好惡同于聖人也。」¹³ 其說得之，可與章氏駁論相得益彰。

三、《左氏》與《春秋》之依違問題

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之說，蓋起於西漢哀帝時，劉歆與五經博士講論經義，諸博士或不肯專對，或曰左氏不祖孔子，或曰左氏不傳《春秋》。後經中唐啖助、趙匡新《春秋》學派之倡導，宋人疑經疑傳風氣之推揚，至清代劉逢祿撰《左氏春秋考證》二卷，乃變本加厲，高舉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之說，謂條例皆子駿所竄入，授受皆子駿所構造，著《左氏春秋考證》及《箴膏肓評》，自申其說。於是太炎先生為作《春秋左傳讀續錄》、《春秋左氏疑義答問》以批駁其非；其他，《劉子政左氏說》、《檢論》、《煊書》，以及〈與劉光漢書〉、〈再與

¹² 同註1，〈論左氏為丘明〉，頁50-58。

¹³ 劉師培：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，〈讀左劄記〉（臺北：華世出版社，1975年），頁350-351。

劉光漢書》，亦隨文申明「《左氏》解傳《春秋》」之義。

章氏《春秋》學論著，數其精華聚焦，綱舉目張，則莫詳於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一書。今就章氏匡謬補闕，訂正得失處，以《左氏》與《春秋》二書之關係為主題，考察其依違離合，以見太炎先生《春秋》《左傳》學之一斑。為方便研討，下分三段論述：其一，《左氏》之自釋《春秋》；其二，諸經傳體之不一；其三，經傳之存闕緣飾：

（一）《左氏》之自釋《春秋》

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明言：魯君子左丘明「因孔子史記，具論其語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」；唐孔穎達《春秋疏》引賈逵說，亦謂「魯君子左丘明作《傳》」。由此觀之，太史公固以《左氏》為《春秋》之傳，章氏之言曰：

尋太史言：「因孔子史記，具論其語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」因之云者，舊有所仍，而數暢其指也。且曰：「懼弟子人人異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。」此謂口授多詭，故作書以為簡別，固明《春秋》之義，非專塗堦其事矣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11）

又，《吳太伯世家》贊云：「余讀《春秋》古文，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、句吳兄弟也。」此本《左傳》「太伯、虞仲、太王之昭」為說。若如《呂氏》書，得稱《春秋》古文否？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11）

又，《歷書》云：「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，而《春秋》非之。」此本《左氏》文元年傳，若如《呂氏》書，可單稱《春秋》邪？必若拘牽題號，則《後漢書·樊儵傳》云：「受《公羊嚴氏春秋》。」又云：「儵刪定《公羊嚴氏春秋章句》。」假令《左氏春秋》為《呂氏》之類，則《公羊嚴氏春秋》何非以《呂氏》之類乎？鐸、虞二家乃演暢《左氏》書者，亦非《呂氏》可比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11-812）

由《史記》〈太史公自序〉、〈孔子世家〉及著書旨趣觀之，司馬遷《史記》考信於六藝，折衷於夫子之意顯然；史公私淑孔子，《史記》典範《春秋》，劉師培〈史記述左傳考自序〉已發其微，¹⁴ 劉正浩《太史公左氏春秋義述》、張添丁《司馬遷春秋學》、胡豔惠《史記之春秋書法研究》諸論著，多已證成其說。太史公於《史記》中行文，往往以《春秋》指稱《左傳》，前所引〈吳太伯世家〉、〈歷書〉特其顯例。《十二諸侯年表·序》所謂「因孔子史記，具論其語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」云云，亦極明確無疑。班固雖曾質疑《左傳》，然《漢書·藝文志》亦謂：「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，而作《春秋》，有所貶損，事形於傳。懼罹時難，故隱其書。末世口說流行，遂有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鄒氏》、《夾氏》諸傳。」可見司馬遷、班固、孔穎達等固以《左氏》為解釋《春秋》經之傳，夫復何疑？諸家之質疑，蓋在《左氏春秋》與《左氏傳》之稱謂上，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開宗明義即云：「曰《左氏春秋》，與《鐸

¹⁴ 同上註，《左龠集》卷二，〈史記述左傳考自序〉，頁1451。

氏》、《虞氏》、《呂氏》並列，則非傳《春秋》矣。」此一論斷，似是而非，啓人疑竇。章太炎先生爲之批駁曰：

駁曰：名者，實之賓。《左氏》自釋《春秋》，不在其名《傳》與否也。正如《論語》命名，亦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。《論衡·正說篇》云：「初，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，官至荊州刺史，始曰《論語》。」是《論語》乃扶卿所名。然則其先雖不曰《論語》，無害其為孔子之語也。正使子駿以前，《左氏》未稱得傳，亦何害其為傳經乎？若《左氏》自為一書，何用比附孔子之《春秋》，而同其年月為？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10-811）

駁曰：史公亦未嘗不以《左氏春秋》為傳。文有異同，自得泛引。若必以題署為言，則漢人稱《公羊春秋》者正多，而《史記》亦無《公羊傳》三字。惟《儒林傳》云：「董仲舒名為明於《春秋》，其傳《公羊氏》也。」由仲舒而謂之傳，韓太傅之徒，恐未必許其名號矣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54）

太炎先生提出「名者，實之賓。《左氏》自釋《春秋》，不在其名《傳》與否也。」此真一針見血、切中肯綮之論。自劉逢祿以下，康有為、陳槃諸家，主張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者，多從名號稱謂上推衍，以為司馬遷稱《左氏》為《左氏春秋》，未稱為《左氏傳》，可證《左氏》並非《春秋》之傳，並非解經之書。進而認為：《左氏傳》、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左氏春秋》之名，皆為劉歆杜撰之名。¹⁵ 劉歆是否杜撰《左氏傳》名稱、是否偽作群經及《左傳》，錢穆著《劉向歆父子年譜》，覆按康有為《新學偽經考》，所謂劉歆偽造《左傳》云云，皆虛妄不實，「要而述之，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」，¹⁶ 已條舉其非是。太炎先生揭櫫「名者，實之賓。《左氏》自釋《春秋》，不在其名《傳》與否也。」此真高屋建瓴之論。何況，「文有異同」，致名稱不一，若執題署為信，則「漢人稱《公羊春秋》者正多，而《史記》亦無《公羊傳》之名。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可以定猶豫，斷疑似。太炎先生駁語，中有兩段，足以釋疑定讞，權作小結：

總之，《左氏春秋》之名，猶《毛詩》、《齊詩》、《魯詩》、《孟氏易》、《費氏易》、《京氏易》、《歐陽尚書》、《夏侯尚書》、《慶氏禮》、《戴氏禮》，舉經以包傳也。以為不傳孔書而自作《春秋》者，則諸家亦自作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乎？（章太炎《春秋左

¹⁵ 詳參康有為：《新學偽經考》、陳槃《左氏春秋義例辨·綱要》，三、〈左氏春秋之名義〉，頁37-42。

¹⁶ 同註2，如云：「歆領校《五經》未數月，即能徧偽諸經，不可通二也」；「謂將以纂聖統，則歆既得意，為國師公，莽加尊信，而莽朝《六經》祭酒、講學大夫多出今文諸儒，此又何說？不可通十七也。」「歆以前，其父向及其他諸儒，奏記述造，引《左氏》者多矣。《左氏》自傳於世，謂盡歆偽，不可通二十二也。」此真鐵案如山，足以斷疑讞矣。然後世倡言劉歆偽造《左傳》者，多未批駁錢賓四之論證，是《易傳》所謂「遁辭知其所窮」，頁2、4、5。

傳讀敘錄》，頁 863）

後序：自仲尼作經，弟子既人人異端，故左氏具論本事以為之傳，若櫟括之正曲木，平地之須水準。自是以降，七十子或散在諸侯，猶以緒言教授，而亦略記《左氏》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64）

關於春秋以降，諸子經史引述《左氏》者，所在多有，劉師培《讀左劄記》、《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》、《春秋左氏傳例略》；《左龔集》中論述亦多，如〈孔子作春秋說〉、〈春秋三傳先後考〉、〈左氏不傳春秋辨〉、〈周季諸子述左傳考〉、〈左氏學行於西漢考〉、〈史記述左傳考自序〉等，¹⁷ 多已發凡起例，可與太炎先生之批駁辨難相發明。

（二）諸經傳體之不一

夫人之患，在以己度人，先入為主，若闔於自見，師心自用，則容易生發偏見錯會，導致推論謬誤失準，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論《左氏》既名《左氏春秋》，遂據名稱作錯誤類比，以為與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呂氏春秋》之書同名等倫，實「非傳之體」。殊不知諸經傳體不同，甚至於「一人所述，尚有異端」，何能勉強《左氏》與《公羊》同體？略云：

劉曰：「太史公時名《左氏春秋》，蓋與《晏子》、《鐸氏》、《虞氏》、《呂氏》之書同名，非傳之體也。《左氏傳》之名，蓋始於劉歆《七略》。」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1）

駁曰：所謂傳體者如何？惟《穀梁傳》、《禮喪服傳》、《夏小正傳》與《公羊》同體耳。毛公作《詩傳》，則訓故多而說義少，體稍殊矣；伏生作《尚書大傳》，則敘事八而說義二，體更殊矣；《左氏》之為傳，正與伏生同體。然諸家說義雖少，而宏遠精括，實經所由明，豈必專尚裁辯乃得稱傳乎？孔子作《十翼》，皆《易》之傳也，而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繫辭》、《說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雜卦》，其體亦各不同。一人所述，尚有異端，況《左氏》與《公羊》，寧能同體？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1）

解經之書，謂之傳；劉氏以《公羊傳》之傳體為本位，據此繩愆規範以歷史敘事為傳體之《左氏》，自然入主出奴，大相逕庭。《春秋》三傳各有異同，不害其為解《經》之書；傳體之不同，乃諸家解經視點殊相之當然，劉氏先入為主，遂有此誤解。因此，除《穀梁傳》、《儀禮·喪服傳》、《大戴禮·夏小正傳》之傳體，與《公羊傳》同體，多採答問提問式以外，解經之諸傳無一與《公羊傳》同體。如毛公作《詩傳》，伏生作《尚書大傳》，或孔子所作《易傳》——《十翼》，其體亦各不同，甚至「一人所述，尚有異端」，何能強求「《左氏》與《公羊》同體」？太炎先生稱：「《左氏》之為傳，正與伏生（《尚書大傳》）同體」，然則，《左氏》

¹⁷ 同註 13，《讀左劄記》，頁 349-358；《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》，頁 389-401；《春秋左氏傳例略》，頁 415-420；《左龔集》第二卷，頁 1445-1451。

之傳體為何？於解讀《春秋》經是否有扞格齟齬之處？試看太炎先生所云：

《左傳》之為左專，猶鄭氏說《詩》稱《鄭箋》。箋者，表識書也。同此，傳名得兼傳記、傳注二用，亦猶裴松之之注《三國志》，撰集事實，以見同異，間有論事情之得失，訂舊史之臆非，無過百分之一，而解詁文義，千無二三。今因《左氏》多舉事實，謂之非傳，然則裴松之之於《三國志》，亦不得稱注邪？且《左氏》釋經之文，科條數百，固非專務事實者。而云非傳之體，則《尚書大傳》又將何說？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21-822）

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序》稱左丘明「因孔子史記，具論其語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」；《漢書·藝文志》亦稱：「丘明論本事而作《傳》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說《經》也。」若據司馬遷、班固之論述，則《左氏》以歷史敘事方式解釋孔子《春秋》經，最得傳體之神髓，最能妙傳孔子之微言大義。究其原因有二：其一，《左傳》藉事明義，頗能盡《春秋》「推見至隱」之精神。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太史公曰：「孔子著《春秋》，隱、桓之間則章，至定、哀之際則微，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，忌諱之辭也。」¹⁸《漢書·藝文志》亦謂：「《春秋》所貶損大人，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，其事實皆形於《傳》，是以隱其書而不宣，所以免時難也。」此《左傳·成公十四年》君子曰所謂「微而顯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盡而不汙」，此《左傳》以敘事解經之法。¹⁹其二，《左氏》敘事，合於古春秋記事成法。兩者相乘，最有功於解《經》。劉師培〈古春秋記事成法考〉，舉古春秋多「爰始要終，本末悉昭」，記事以詳為尚；推而至於殷墟卜辭、兩周彝銘，以及《尚書》之文體，亦多近《左氏》之敘事。²⁰《左氏》以歷史敘事方式解釋《春秋》經，是讓歷史自己講話，系統地、完整地、曲折地、趣味地，將春秋時代之變遷、成就、矛盾、衝突，清楚而生動表達出來；此之謂「以史傳經」，與《公羊傳》「以義傳經」，代歷史講話大不相同。²¹要之，《左氏》以歷史敘事體式解釋《春秋》，故與《公羊傳》以歷史哲學（義）解經不同。劉逢祿於此，曾有質疑，太炎先生亦有辯駁：

劉曰：「《春秋》非史文，言《左氏》者以史文視《春秋》，宜其失義也。范辨卿之論甚正，非陳元、賈逵之流曲學阿世所能勝也。」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45）

駁曰：孟軻言：「其文則史。」〈十二諸侯年表〉亦云：「論史記舊聞，興於魯而次《春

¹⁸ 司馬遷著，瀧川資言考證：《史記會注考證》卷一百十〈匈奴列傳〉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1993年），頁 1201。

¹⁹ 張高評：《左傳之文韜》，〈《左傳》之史筆與詩筆——以形象化、精煉性為例〉（高雄：麗文文化公司，1994年），頁 165-175。

²⁰ 同註 13，〈古春秋記事成法考〉，頁 1445。劉節：《中國史學史稿》，三、〈古代史籍的雛形及其蛻變〉（臺北：弘文館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頁 17-26。

²¹ 徐復觀：《兩漢思想史》卷三，〈原史〉，十、「左氏『以史傳經』的重大意義與成就」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79年），頁 271-276。

秋。」然則《春秋》義經而體史，若云非史，則《詩》亦非樂章，《易》亦非筮辭邪。且《藝文志》：《太史公》百三十篇列于《春秋》家。古者經史本非異業，荀勗之分四部，不學無術，明哲所譏。……至於成、哀，長夜向明，固知《春秋》之書猶夫史耳。稱之為史，無害麟筆之尊嚴，正如馬、班二史，與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並列，而體例崇卑，山頭井底不足比喻。佔畢之士，靡不明之。今必謂《春秋》非史，是巫祝之讐言，非學者之平議也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45-846）

後代所題，《經》稱仲尼，《傳》稱丘明，徒以箸于竹帛，字蹤筆跡之所發者，則據為主名耳。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本以和布當世事狀，寄文于魯，其實主道齊桓晉文之事。五伯之事，散在本國乘載，非魯史所能具，為是博徵諸書，貫穿其文，以形于《傳》，謂之屬辭比事。……書于《魯史》者，則無嫌于闕文，然後無害凡例，其褒貶損抑亦著焉。經傳相依，年事相繫，故為百世史官宗主。苟意不主事，而偏矜褒貶者，《論語》可以箸之，安賴《春秋》？（章太炎《檢論》卷二〈春秋故言〉，《章氏叢書》本，頁532）

劉逢祿批評「言《左氏》者以史文觀《春秋》」之「失義」，關鍵前提為「《春秋》非史文」，其認知有待商榷。《孟子·離婁下》討論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曾稱：「其事，則齊桓、晉文；其文，則史；孔子曰：『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』」可見，孔子之《春秋》，由其事、其文、其義三者有機組合而成，「其文」為其中之一。《孟子》趙岐注：「其文，史記之文也。孔子自謂竊取之，以為素王也。」焦循《正義》曰：「《春秋》之文則史也，其義則孔子取之。」²² 無論趙岐或焦循，皆以史文視《春秋》。太炎先生援〈十二諸侯年表序〉為證，而特提《春秋》經之性質，為「義經體史」，此真論《春秋》之洞見與特識。又特提《左氏》以「屬辭比事」之法傳孔子《春秋》，遂與《春秋》相表裏，為百世史官宗主。蓋所謂《春秋》也者，本有魯史《春秋》和孔子《春秋》之別；魯史《春秋》有史法，聖人《春秋》有史義，而史文皆寓乎其間。綜要言之，自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》、蘇轍《春秋集解》、趙汴《春秋師說》，以及劉師培、章太炎等古文經學家論《左氏》，皆以為「義經體史」；而啖趙以下疑經疑傳，及今文《公羊》學家如劉逢祿、康有為及皮錫瑞等，多主張「《春秋》是經《左氏》是史」，²³ 古文今文之派分，經史合一或經史異轍，影響《左氏》是否傳《春秋》。

關於史文與《春秋》、《左氏》之關係，宋蘇轍、元黃澤之《春秋》學之發明，頗稱具體而切實，如：

²² 〔漢〕趙岐注、〔清〕焦循：《孟子正義》卷十六，〈離婁下〉第21則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574。

²³ 皮錫瑞：《經學通論》，刊行於光緒丁未（三十三年，1907年），四、〈春秋·論《春秋》是經，《左氏》是史……〉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），頁49-50。

故凡《春秋》之事，當從史。《左氏》，史也。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，皆意之也。蓋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事亦略矣，非以為史也，有待乎史而後足也。以意傳《春秋》，而不信史，失孔子之意矣。（《春秋集解》卷一，頁4）

《春秋》者，有待於史而後足，非自以為史也。世之為《春秋》而不信史，則過矣。（《春秋集解》卷九，頁5）

魯史《春秋》有例，夫子《春秋》無例；非無例也，以義為例，隱而不彰也。（元趙沅《春秋師說》卷上，頁6）

學《春秋》以考據《左傳》國史事實為主，然後可求書法。能考據事實而不得書法者，亦尚有之；未有不考據事實，而能得書法者也。（同上，卷下，頁4）

蘇轍《春秋集傳》，闡發《左氏》「以史傳經」之特色。²⁴ 謂「《春秋》之事當從史」，「《春秋》者有待於史而後足」，可證劉逢祿質疑「《春秋》非史文」，「言《左氏》者以史文視《春秋》」之乖違事理。以史文視《春秋》，是謂得其要領，掌握關鍵，未為「失義」。元趙沅《春秋師說》引述其師黃澤之說，以為《春秋》有義例，因書法「隱而不彰」，故研治《春秋》，當「考據《左傳》國史事實為主，然後可求書法」；²⁵ 亦可見劉逢祿以「惟務事實」歸咎《左氏春秋》「不知而作」（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16）；又批評「班氏以史論《左氏》，知《左氏》者也」，可謂弄拙成巧，點非成是。班固《漢書》，實宗法《左氏》者，²⁶ 故追本溯源如是之精確。班氏「以史論《左氏》」，是深知《左氏》者。

（三）經傳之存闕緣飾

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不同，議論精神與懷疑精神為其七大頂樑柱之二。²⁷ 懷疑與議論精神之發用，宋代遂多疑經疑傳之說。²⁸ 就《春秋》經傳而言，或以《左氏》「於《經》外自成一書」；或謂《左氏》：「《春秋》所無者，或自為傳」；或評《左氏》「雖依經作傳，實則自為書」；或稱《左傳》「凡言『君子曰』，是劉歆之辭」，²⁹ 已開啓晚清今文學派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

²⁴ 張高評：〈蘇轍《春秋集傳》以史傳經初探〉，「解讀《春秋》，專主《左傳》敘事」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《宋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06年），頁378-384。

²⁵ 張高評：〈黃澤論《春秋》書法——《春秋師說》初探〉，《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「研治《春秋》，魯史書法與聖人書法應相濟並用」，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00年），頁591-598。

²⁶ 班固《漢書》敘事，專學《左氏》，宋·范溫《潛溪詩眼》第17則載曾鞏言：「司馬遷學《莊子》、班固學《左氏》」；黃庭堅亦云：「司馬遷學《莊子》，既造其妙；班固學《左氏》，未造其妙也！」宋·呂本中《童蒙訓》第48則：「班固敘事詳密，有次第，尚學《左氏》。」郭紹虞《宋詩話輯佚》本，（臺北：文泉閣出版社，1972年），卷上，頁403；卷下，頁249。

²⁷ 陳植鏞：《北宋文化史述論》，第三章第四節〈宋學精神〉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287-303。

²⁸ 參考葉國良：《宋人疑經改經考》，國立臺灣大學《文史叢刊》之五十五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，1980年）。楊新勛：《宋代疑經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。

²⁹ [清]朱彝尊原著，林慶彰、蔣秋華等編審：《點校補正經義考》，卷一百六十九〈春秋二〉，引王哲

秋》」說之先聲。其中，莫詳於南宋永嘉學派陳傅良《左氏章指》之論述：

公之《章指》謂：「君子曰」者，蓋博采善言；禮也者，蓋據史舊文，非必皆合于《春秋》。或曰後人增益之，或曰後人依倣之；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，或以例非《左氏》之意，蓋愛而知其惡者，乃所以為忠也。又言：莊公元年至七年，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，多無傳，疑有佚墜。公之求於傳者，詳矣。（宋樓鑰《攻媿集》卷五十一，〈止齋《春秋後傳》、《左氏章指》序〉，《四部叢刊》初編，頁467）

陳傅良《左氏章指》三十卷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曾著錄，清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卷一百八十七〈春秋二十〉注明「未見」。據南宋樓鑰序言，《左氏章指》就「君子曰」與「禮」二大端發論：無論增益或依倣，以為都出於後人；而所謂「凡例」者，或淺而不取，或非《左氏》之意。其他，又懷疑經存傳闕問題。陳傅良考求《左氏》如此其詳，雖稱「愛而知其惡」，對於晚清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、康有為《新學偽經考》之討論《春秋》經傳之存闕緣飾，不無啓迪作用。

《左氏》與《春秋》間經傳之依違關係，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十分注目。舉凡可以佐助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者，無不援引，用資考證。「傳」也者，既為解經之書，理當依經闡釋發明，不可有所疏離或出入，此之謂「據經發義」（頁812），如後世之注疏正義者然。劉氏考察《左氏》與《春秋》，發現存在若干疏離：或經闕傳存，或經有傳無，因而懷疑《左氏》與《春秋》間經傳關係之出入，遂指為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之事證。尤其經闕傳存問題，更衍申擴大，而有《左氏》緣飾附益諸學術公案。太炎先生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本「因逢祿《考證》訂其得失」，故多所駁難，如云：

劉曰：「《左氏》記事，在獲麟後五十年。……《經》所不及者，獨詳志之，又何說也？《經》本不待事而著。夫子曰：『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』何《左氏》所述君子之論乖異也？」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25）

駁曰：《傳》稱「悼之四年」者，或左氏壽考，如子夏為魏文侯師，或悼字乃弟子所改，俱不可知。……詳《經》所不及者，或窮其源委，或言有可采，事有可觀；無非為經義之旁證。觀裴松之之注《國志》，本傳不列其名，而引以相稽者，多矣。《左氏》說《經》，豈有異是？《經》固重義，若謂不待事而著，則何不空設條例，對置甲乙，以極其所欲言？而必取已成之事，加減損益，如削趾適履者之所為，既誣古人，又不能與意密合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26）

劉逢祿：「《左氏》記事，在獲麟後五十年。」此指《左氏》有附益增續；謂「《經》所不

及者，獨詳志之」，此指經傳間存闕依違之問題。附益問題詳後，暫不論。《左氏》與《春秋》之關係，就《經》無《傳》有，《經》闕《傳》詳而言，所謂「詳《經》所不及者」，太炎先生稱「無非爲經義之旁證」，其言甚是。蓋左氏躬爲史官，國史得見而詳，故傳有舍經而別載行事之文，章太炎《檢論》卷二舉例，如魏賜繁纓，晉鑄刑書，鄭獻陳捷，紇却齊田，婁戡豎牛，臆數鬻獄，僑存鄉校諸事，其較著者焉。若斯之比，經無而傳有者，章氏以爲皆經義之旁證。《經》闕《傳》詳之故，除章氏所言爲《經》義之旁證外，又有下列四家之說，頗多發明：

據此，則《經》無而《傳》有者，悉皆《經》之微言。仲舒之論《公羊》如此，使仲舒而治《左氏》，則當謂處處皆微言矣。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845）

左氏作傳，本不以年分篇……後之編次者因每年必欲以年冠首，年上不容更著一字，於是割置前年之末，而文義之不安者多矣。……此傳與彼不殊。今以經文隔之，遂令孤懸卷首，無所繫屬。（俞樾《群經平議》釋襄二十五年傳「齊人城郕……秦晉爲成」，又參《春在堂全書》〈左傳古本分年考〉）³⁰

《春秋》文多闕誤，三傳類多附會，而《公》《穀》尤甚。……《春秋》自脩成之後，則爲孔氏之私書，又定哀以後多有所刺譏隱諱，故當時游、夏不能贊一辭。……至孟子始標出「知我罪我」，及「其義則丘竊取」之言，而是時去孔子已百年矣。書藏于私家，其補綴脩輯，必不能如官中之勤。闕誤，是理之所有，無可疑者。³¹

《志》稱「《春秋》所貶損大人，當世君臣有威勢力，其事實皆形於傳。」是《經》以約詞爲宗，《傳》主弼經而作。《傳》詳《經》簡，所以抒行事而闡譏褒。《傳》有《經》無，所以明刊削而昭簡擇。³²

由此觀之，《經》闕《傳》詳之故，除上述「詳《經》所不及」外，尚有章氏「發揮《經》之微言」，俞樾「因割《傳》以附年」；顧陳高「私書闕誤，理之所有」；劉師培「明刊削而昭簡擇」諸說。另外，據晉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·序》稱：《左傳》往往著其「不書」，以見《春

³⁰ 案：《杜預集解·序》謂：「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」，知以經冠傳首，始於杜預，而丘明作傳，因與經別行矣。非徒左氏也，即公羊穀梁，亦莫不皆然。證以東漢熹平石經，知春秋經固與公羊傳分行也（羅振玉說）。其後學者治三傳，爲免虛發與混淆，乃以傳文附綴所繫經文之後，此經傳分合之始末也。

³¹ 章太炎《檢論》卷二〈春秋故言〉云：「義者，《春秋》凡例，掌在史官，而仲尼以退吏私受其法，似若盜取，又亦疑于侵官，此其言『罪』言『竊』所由也。」《章氏叢書》本，頁531。顧陳高：《春秋大事表》卷四十三，春秋闕誤凡百餘條，備舉自左氏杜預孔穎達以來諸家之說，頗可信據。〈春秋闕文表〉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4年），頁749-758。

³² 劉師培：《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》，〈明傳篇第三〉，其《春秋左氏傳例略》舉證以明傳有經無之故。同註13，頁389-390、415-420。

秋》之微言大義；不言、不稱之例亦然。³³ 要之，《左氏》之所書，要皆為表裏《春秋》，發明《經》義，不可因《經》闕《傳》存，率指為「不傳《春秋》」。

《左氏》與《春秋》之依違離合，由《經》闕《傳》存，衍生而為《左氏》傳《經》之緣飾附益問題，更進而指出劉歆偽造《左傳》一書矣。且看劉逢祿《箴膏肓評》之見，以及章太炎《駁箴膏肓評》，³⁴ 兩造之攻防論說，其言曰：

何休曰：「說《左氏傳》者曰：『《春秋之志》，非聖人孰能修之？』言夫子聖人，乃能修之。御叔謂臧武仲為聖人，是非獨孔子。」

《評》曰：「《左氏》好記瑣事，如〈御叔篇〉全不涉《經》，《左》故也；如〈黑肱篇〉妄增邾字，設為傳《春秋》者，非《左》故也。何君不攻其本而治其末，未為知《左氏》矣。」

駁曰：……劉以《左氏》好記瑣事，不知此以見魯大夫之傲慢，穆叔之明于政體，非細故也。其于《經》亦有旁通之法，故有無《經》而發《傳》者，有《傳》舉他人之言，盈篇累牘而與《經》不涉者，每借以發別條《經》之誼，非深觀會通，未能明也。……然何休雖妄論《左氏》，猶不至謂陳、劉諸儒所改竄，至劉氏而益狂悖矣。（章太炎《駁箴膏肓評》，〈何休曰〉，頁 895-896）

劉逢祿《箴膏肓評·何休曰》，援引《經》無《傳》有，《經》闕《傳》詳之實例，作為「《左氏》好記瑣事」，以見《左氏》「全不涉《經》」，「設為傳《春秋》者」之論證，亦劉氏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之申說。章太炎先生駁論強調，此乃《左氏》所以傳《春秋》之一要領，所謂「旁通之法，故有無《經》而發《傳》者」，亦「有《傳》舉他人之言，借以發別條《經》之誼」者，《經》闕《傳》存之例，乍看似與傳《經》不涉，實則乃《左氏》所以傳《春秋》之一大策略，所謂「無《經》而發《傳》者」，率即此等，而劉逢祿、康有為皆以為「不傳《春秋》」。劉逢祿曾稱楊《左氏》之史筆與文辭矣，卻未許其傳《春秋》經，太炎先生亦有駁難，如云：

《左氏》以良史之材，博聞多識，本未嘗求附於《春秋》之義，後人增設條例，推衍事蹟，強以為傳《春秋》，冀以奪《公羊》博士之書法，名為尊之，實則誣之，《左氏》不任咎也。觀其文辭瞻逸，史筆精嚴，才如遷、固，有所不逮，則以所据多春秋史乘

³³ 不書之例，如隱元傳：「費伯帥師城郎，不書，非公命也。」隱十一年傳：「宋不告命，故不書。凡諸侯有命告則書，不然則否。師出臧否亦如之。雖及滅國，滅不告敗，勝不告克，不書于策。」等皆是也。不言者，若隱元年鄭伯克段於鄆，不言出奔，難之也。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田，不言其來，諱之也，是其例也。不稱者，若僖元年不稱即位，公出故也。莊元年不稱姜氏，絕不為親，是其例也。此皆史所不書，即以為義者也。

³⁴ 章太炎：《駁箴膏肓評》，詳《章太炎文集》第二冊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頁 873-900。

及名卿大夫之文，固非後人所能附會，故審其離合，辨其真偽，其真者事雖不合於《經》，益可以見《經》之義。……事固有離之則雙美，合之則兩傷者，余欲以《春秋》還之《春秋》，《左氏》還之《左氏》，而刪其書法凡例，及論斷之謬於大義，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，冀以存《左氏》之本真。（章太炎《駁箴膏肓評》引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一卷、《後證》一卷、《箴膏肓評》一卷〈敘〉，頁 897）

《左傳》自兩漢以來有議其失者，而未嘗妄說為儒者附益。……武進劉氏益甚，乃至以《左氏》工在文字，而無說經之語。買櫝則還珠，受藉則卻璧，其見淺不見深，亦已明矣。諸舉凡例及所論斷，以為劉子駿所增，而不知墨迹有異，不可欺人。事異《公羊》，以為不見寶書，而不知望文生誼，誣造最甚。（同上，頁 898）

劉逢祿《箴膏肓評》正面肯定《左氏》具有「良史之材」，「文辭贍逸，史筆精嚴」，初始與「《春秋》之義」並不相干。由於「後人增設條例，推衍事蹟，強以為傳《春秋》，冀以奪《公羊》博士之書法」，實誣《左氏》。因此，劉氏欲就今本《左氏》「刪其書法凡例，及論斷之謬於大義，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，冀以存《左氏》之本真。」於是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明指「今本《左氏》書法及比年依《經》飾《左》、緣《左》、增《左》。」皆歆所附益；「劉歆強以（《左氏》）為傳《春秋》，或緣經飾說，或緣《左氏》本文前後事，或采他書以實其年。」如此認知，先入為主，引申發揮之，故劉氏所著三書之旨趣，為「以《春秋》還之《春秋》，《左氏》還之《左氏》」。果如此，則《左氏》遂與《春秋》無關，並非解經之傳矣。為論證其說，劉逢祿更以為《左氏》一書，乃由劉歆等緣飾附益者為多。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於此，頗多駁斥。其論點已具見前所述，不贅。今單就「墨迹有異，不可欺人」，再加申說。劉逢祿《左氏春秋》三書，再三以為：「諸舉凡例，及所論斷，以為劉子駿所增。」太炎先生以「墨漆新故，勢有不符」反駁之，其言曰：

劉氏父子校秘書，乃以秘書校常行本，常改行本之字，而不改秘書之字。若子駿改竄秘書之《左氏春秋》以就己意，則自北平獻書、共王壞壁以至子駿，百年有餘，墨漆新故，勢有不符。設博士求觀其書，寧不自敗？若張、魯二本，一改一否，以不改者示博士，則所建立者，仍非己所改本，亦何苦勞心而為此也？且《劉歆傳》云：「河平中，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，講六藝傳記」云云，如有改竄，又豈能欺其父邪？（章太炎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頁 834）

……武進劉氏益甚。乃至以《左氏》工在文字，而無說經之語，買櫝則還珠，受藉則却璧，其見淺不見深，亦已明矣。諸舉凡例及所論斷，以為劉子駿所增，而不知墨迹有異，不可欺人。事異《公羊》，以為不見寶書，而不知望文生誼，誣造最甚。（章太炎《駁箴膏肓評》，頁 898）

錢賓四《劉向歆父子年譜·序》謂：「向死未二年，歆領校《五經》未數月，即能徧僞諸經，不可通二也」。案：歆父劉向，卒於漢成帝綏和元年（西元前八年）。次年，哀帝即位，王莽舉劉歆為侍中，「遷光祿大夫，後領《五經》」。哀帝建平元年（西元前六年），「歆請建立《左氏春秋》，及《毛詩》、《逸禮》、《古文尚書》，移書讓太常博士。」就時間推算，「向卒至今，纔踰一年。至莽之薦歆，得為光祿大夫領校《五經》，殆不出數月事也。」因此，錢氏斷定劉歆並無徧僞《五經》之時間。且既已為新莽之國師，亦無「徧僞群經之必要」。³⁵ 其說據年譜史事推斷，理甚宏通可取。再覆按太炎先生駁語，設使劉歆真能徧群經，古籍多書諸竹簡，若經改竄附益，則「墨漆新故」昭然顯然瞭然，「墨迹有異，不可欺人」；新故之間，「其勢不符」，頗難欺瞞。

平情而論，《左氏》必有後學之緣飾附益，秦漢古籍皆然，不獨《左氏》；顧不必然即為東漢劉歆所僞造，錢賓四《劉向歆父子年譜》已證成其說。太炎先生於此雖有批語，唯楊向奎氏以為「駁辯無力」；「君子之論多乖異」云云，「太炎先生亦無說」。³⁶ 唯《左氏》是否有後人緣飾附益，與《左氏》是否為解釋《春秋》之《傳》，應是二事，似不應混為一談。楊伯峻著有《春秋左傳注》一書，強調「《左氏傳》是「傳」《春秋》的」，《左氏傳》以四大法式解說《春秋》，說明書法，一也。用事實補充，甚至說明《春秋》，二也。訂正《春秋》的錯誤，三也。《春秋》經所不載的，《左傳》出於「無經之傳」發明之，四也。³⁷ 試回顧本文論述，大抵暗合楊說之見解。先賢指稱《左氏傳》與《春秋》經，自有「相互表裏」之依存關係，即謂此等。

其他，有關本問題之論述，《左傳》之作者究竟為誰？仍莫衷一是，或以為魯太史左丘明，³⁸ 或據姚鼐說主「吳起之徒為之者尤多」；³⁹ 或以為非左丘明作，亦非劉歆僞作。⁴⁰ 此外，《左傳》之作者，又有子夏、張蒼、左史倚相、子貢諸侯選人。⁴¹ 眾說紛紜，文獻不足徵，姑置之不論可也。

³⁵ 同註2，《劉向歆父子年譜》，〈綏和元年〉、〈綏和二年〉、〈哀帝建平元年〉，頁63-65、67-68、74-82。

³⁶ 楊向奎：《繡經室學術文集》，〈試論章太炎的經學和小學〉，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9年），頁35-41。

³⁷ 楊伯峻：《楊伯峻治學論稿》，〈淺談《左傳》〉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92年），頁55-58。

³⁸ 胡念貽：《先秦文學論集》，〈論《左傳》〉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116-121。

³⁹ 童書業：《春秋左傳研究》，附錄、〈《春秋左傳》作者推測〉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頁351-352。

⁴⁰ 趙光賢：《古史考辨》，〈《左傳》編撰考〉（上）（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頁150-164。

⁴¹ 同註1，第三章第一節，甲、〈駁左氏非丘明〉，頁36-50。

四、結論

晚清康有為、梁啟超主張變法維新，受達爾文進化論影響，以《公羊》三世說作為理論淵源，以張皇其學說。章太炎早年從事革命活動，反對變法維新，因而批判《公羊》今文學，而表彰《左氏》古文學。章氏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之著書旨趣，最初本為反對康有為《新學偽經考》而發，⁴²終則追本溯源，射人先射馬，擒賊先擒王，批駁劉逢祿之《左氏春秋考證》。筆者探索太炎先生之《春秋》《左傳》學，選擇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為主要文本，旁及章氏《駁箴膏肓評》、《檢論·春秋故言》、《春秋左氏疑義答問》、《煊書》諸作，以章氏所駁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為參照，就劉氏所倡「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」說為核心，初步獲得下列觀點：

- (一) 劉逢祿著《左氏春秋考證》，「本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之說，謂條例皆子駿所竄入，授受皆子駿所構造」；以為「《左氏春秋》，舊名也；曰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則劉歆所改也」；「《左氏春秋》，與《鐸式》、《虞氏》、《呂氏》並列，則非傳《春秋》也。」由此觀之，其核心問題有二：即左氏非丘明，與《左氏》不傳《春秋》。
- (二) 錢穆《劉向歆父子年譜·自序》稱康有為《新學偽經考》：「持其說最備，余詳按之皆虛。要而述之，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。」略謂：劉歆並無偽造群經之時間，更無偽造群經之必要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之見最為宏通持平，所謂「刪除事跡，何由知其是非？無案而斷，是《春秋》為射覆矣」，可見《左氏》解傳《春秋》經。
- (三) 關於左丘明與孔子之關係，考察章氏之駁文，大抵有四大層面：其一，左丘明為孔子朋友，非孔門弟子；其二，作《傳》之左丘明，與《論語》之左丘明同為一人；其三，左氏為魯史官，受學不需師保；其四，左氏與孔子曾共觀周史，經傳相互表裏。
- (四) 《左氏傳》之作者，確為左丘明。國史非史官莫能見而知其詳，先秦惟史官躬與國史之修；集百二國寶書而為《傳》，非史官不能成此簡編；左丘明為魯太史，受學不需師保，能躬閱國史策書；史德據事直書，與修德之惡夫巧佞殊科，作《傳》之左丘明即同恥之左丘明；左氏與孔子同時，以修《春秋》必謀之史官，故丘明不入弟子之列。此自《左氏》一書「義經、體史，而用文」，可以知之。
- (五) 章氏再三申說《嚴氏春秋》所引《孔子家語·觀周篇》，強調孔子與左丘明，共乘觀周，《經》之與《傳》「同作具修」，「相持而成」。因此《左氏》與《春秋》，必須「相持成書，事義始備」，猶後世修史，列傳與本紀，彼此參會，相得益彰。

⁴² 參考朱維錚：《中國經學史十講》，9，〈重評《新學偽經考》〉、《偽經考》的邏輯和意向，朱一新駁《偽經考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200-204。

者然。桓譚《新論》稱：《左氏傳》于《春秋》經相互表裏，最稱具體切實。

- (六) 探索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，以《左氏》與《春秋》二書之關係爲主題，考察其依違離合，以見太炎先生《春秋》《左傳》學之一斑。爲方便研討，分三端論述：其一，《左氏》之自釋《春秋》；其二，諸經傳體之不一；其三，經傳之存闕緣飾。
- (七) 太炎先生提出「名者，實之賓。《左氏》自釋《春秋》，不在其名《傳》與否也。」劉歆是否杜撰《左氏傳》名稱、是否僞作群經及《左傳》，錢穆著《劉向歆父子年譜》，覆按康有爲《新學僞經考》，所謂劉歆僞造《左傳》云云，皆虛妄不實，「要而述之，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」，鐵案如山，已論證其非是。
- (八) 《春秋》三傳各有異同，不害其解《經》；傳體之不同，乃諸家解經視點之本然，除《穀梁傳》、《喪服傳》、《夏小正傳》之傳體，與《公羊傳》同體外，解經之諸傳無一與《公羊傳》雷同。如毛公作《詩傳》，伏生作《尚書大傳》，或孔子所作《易傳》，其體亦各不同，何能強求「《左氏》與《公羊》同體」？蓋《左傳》藉事明義，頗能發揮《春秋》「推見至隱」之精神。《左氏》敘事，合於古春秋記事成法。兩者相乘，最有功於解《經》。
- (九) 《經》闕《傳》詳之故，除太炎先生提出「詳《經》所不及」、「發揮《經》之微言」外，尚有俞樾「因割《傳》以附年」；顧陳高「私書闕誤，理之所有」；劉師培「明刊削而昭簡擇」諸說。以及晉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·序》稱：《左傳》往往著其「不書」、「不言」、「不稱」，以見《春秋》之微言大義。要之，《左氏》之所書，要皆爲表裏《春秋》，發明《經》義，不可因《經》闕《傳》存，率指爲「不傳《春秋》」。
- (十) 楊伯峻著有《春秋左傳注》一書，強調「《左氏傳》是「傳」《春秋》的」，《左氏傳》以四大法式解說《春秋》，或說明書法；或用事實補充、說明《春秋》；或訂正《春秋》之錯誤；若經所不載者，《左傳》或以「無經之傳」發明之。本文論述，大抵暗合楊說之見解。桓譚《新論》指稱《左氏傳》與《春秋》經，自有「相互表裏」之依存關係，即謂此等。